

费孝通全集

第十九卷

译文

《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非洲的种族》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费孝通全集·第19卷,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非洲的种族/费孝通译.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3
ISBN 978-7-204-09796-8

I. 费… II. 费… III. 费孝通(1910~2005)—全集 IV. 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203226号

费孝通全集

费孝通 著

责任编辑 王东生 王占英 王继雄

责任校对 县翔

封面设计 宋双成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292

字数 7025千字

版次 2009年10月第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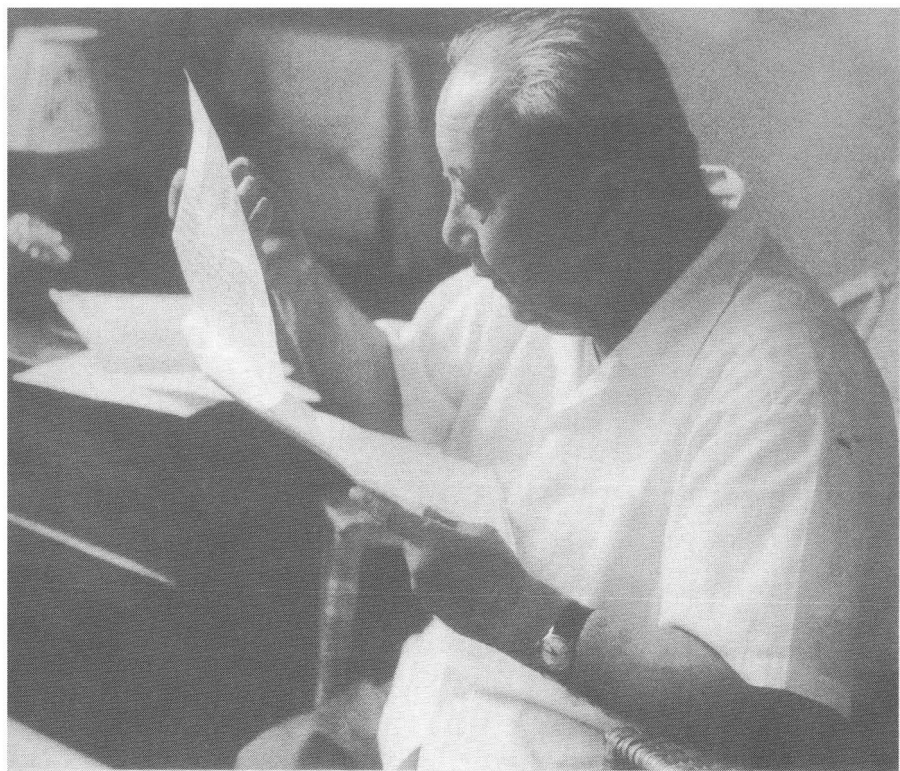
印次 2010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0套

书号 ISBN 978-7-204-09796-8/C·217

定价 880.00元(全20卷)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费孝通在书房里

本卷说明

本卷收录了费孝通先生的《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和《非洲的种族》两部译著。

《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是美国现代社会学家梅岳的经典著作，探讨了工业文明的政治问题及其解决办法，试图有系统地着手引导各种团体和国家在创造文明的事业上进行合作。费老的这个译本曾作为“内部读物”在1964年少量印行过。《非洲的种族》是现代社会人类学先驱塞利格曼的学术经典，他以最浅显的语言描叙了非洲的极其复杂的民族概况。费老曾于1966年暑期前将本书译毕，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译稿散失。1978年又开始重译，在陈观胜和李培英二同志的协助下，于1979年暑初译竣出版。

这两部书的翻译时间距现在已三四十年了，个别人名、地名的译法可能与现在有些差异，另外，书中所用的计量单位均为英制单位，为了保持译著的原貌，我们未作改动，谨请读者注意，并予谅解。

目 录

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

[美] 梅 岳

导言	(3)
提要	(10)
第一编 科学和社会	(14)
第一章 进步的黯淡面	(14)
第二章 乌合之众的假定及其必然的推论， 国家绝对	(46)
第二编 现场研究	(71)
第三章 初步调查	(71)
第四章 霍梭恩和西方电气公司：对于访问的 实验进一步的说明	(79)
第五章 缺勤和转业	(97)
第六章 爱国主义是不够的；我们对人必须没有 仇恨或怨气	(123)
附录一	(135)
附录二	(153)

非洲的种族

[英] 塞利格曼

致 谢	(159)
第一章 导论	(161)
第二章 布须曼人、霍屯督人和尼格利陀人	(170)
第三章 真正的尼格罗人	(189)
第四章 真正的尼格罗人(续)	(207)
第五章 含米特人(东支)	(219)
第六章 含米特人(北支)	(241)
第七章 半含米特人和尼洛特人	(260)
第八章 班图人	(276)
第九章 班图人(续)	(297)
第十章 闪米特人	(310)
附录一	(321)
《非洲的种族》译后记	(325)

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

[美] 梅 岳

导 言

亲爱的唐内姆：

这里是你要求我在摆脱职务之前写的书。在任何意义上，这不是自从你和我——你当时是行政学院研究院的院长——同意极其需要对人类行为和人类关系进行研究之后所做的工作的全部报告。这样一种研究，如果从已经由生物学或有关人的因素这方面的临床医学所证实的假定出发，而不是从其他假定出发，我们相信，它将比直接去研究劳工关系更有效果。我们在纽约的谈话距今已经有 20 年了，而就在那次谈话的下一年——1926 年年中——我们在哈佛大学的工作就在获得洛克菲勒纪念金即后来的洛克菲勒基金的支持下开始了。当时几乎马上有疲劳问题实验室的汉德逊、博克和迪耳的参加。1927 年，娄特利斯伯克开始他对哈佛大学学生极其困难的有价值的研究；这项研究的结果尚未出版。在这本书中要包括西方电气公司的研究以及疲劳问题实验室的许多同各方面的成就——其中有些还属军事秘密——是不可能的；我不能不遵循一条单轨去追寻我们各项研究的无比复杂的启示的发展，并将尽我的能力说明我相信这种启示所具有的对于我们这个被战争所蹂躏的世界的重要性。

自从我们在 1925 年第一次谈论了这些事情之后，局面已发生了悲剧性的变化。在那时，美国或是它的一些自以为是领袖的人们相信繁荣的一般水平已经建立了起来，而循环地发生的经济衰退的问题已经被克服了。我们中间大多数人相信，或

是至少希望，日内瓦的国际联盟开始认真而谦恭地工作，用和平和智慧来代替战争和民族自负。工业的问题看来还没有包含任何对合法改良的隐蔽的威胁。没有人预想到对文明的基础会发生野蛮的进攻。简单说来，在这里同在任何其他地方一样，社会对那些致命的 1929 年以后所发生的事件是完全没有准备的。

现在，经过了一次严重的衰退和人类所遭受过的最可怕的战争，我们面对一个可怜的改变后的世界——在欧洲，城市沦为一堆瓦砾和十足的人类的混乱；在亚洲和太平洋岛屿上，觉醒了和游移不定的群众完全没有准备好负起他们面临的艰巨的责任。在东欧，同在中国一样，农民完全从他那默然忍受和表面上的满足中彻底奋起，正在要求较高的物质生活标准。同在原始人类里所常见的一样，他相信他所要求的一定会得到实现，只要要求的声浪足够浩大。较高的生活是需要不断地重新创造和费力去赢得的，而这一点却非他所能了解；如果他得不到实现，他会很容易相信这是某些人——美国人、民主寡头或资本家——有意把持住不给他的。

还有些人——可能是广播评论员——由于他们对“民主”的热心的辩护，似乎认为在代议政体的许多形式中总有一种可以做到像一个具有妖术的符咒一样——能帮助不论文化怎样低的人民有成效地和有系统地整理出在合作上所存在的问题而予以解决。不幸的是对于这个理论，至少有三个条件限制着民主政体的适用。它们是：

第一，必须在处理技术的能力上和文化水平上有足够的一般标准。可能这个条件不完全适用于，例如，英国历史上某些时期，当时文学和学术的特殊阶级大部分限于宗教集团。在那样一些时代，僧侣阶级所有的政治权力是很有限的，至少在英国是如此；实际上有权力的和有技术成就的阶级，虽然可能比

平民们更有行政经验，但一般并不是有文化的。但是在一个现代的和工业的社会里，最后的决定的权力，如果这些决定是合理的和进步的话，必须授予那些既具有技术的理解又具有社会的理解的团体。这个必需的条件无论如何并不排斥工人和他们的代表的参与，虽然法律界里有些还沉溺于腐旧的和口头上的主权论的那部分却可能会受到排斥。实际上，对于要有一个实际技术和文化的标准的这一要求，只是说明一个很显然的事实，一个具有适应力的社会，只有具有适应力的人才能加以控制。而这又包含一种需要，就是对于训练和教育的概念需要大大地改进，训练和教育的方法也同样需要改进。个人的适应力只有通过经验和教育才能获得。一成不变的日常训练只适合于一个“定了型的”社会；它不能满足由现代科学和技术所创造的世界的需要。

第二，代议政体在一个许多不同的社会团体在物质生活标准上表现着极端差别的社会里，并不一定能令人满意地为社会公众的福利服务。这个先决条件在较低的阶级为了生活而艰苦劳动还是不能满足他们生理的和社会的需要时特别正确。历史上这种例子很多，如 18 世纪后期的法国和 19 世纪早期的英国。整个社会具有足够高的物质生活标准作为民主制度的先决条件是个明智的规定。英国在战时保证每个儿童，不论他的社会身份和经济情况，在生活必需品上都有足够的供应，就是它认识到这个需要。

第三，代议政体如果在一个许多团体互相敌视仇恨、从而内部分裂着的社会里，那是不能行之有效的。还存在着这样一种严重的危险，民主国家里的一些政治领袖和工业领袖对于行政方法的极端无知，也容易引起在合作上日益增长的无能作

为。凯逊指出^①那种郁血症——那些具有社会职能的团体不能合作和随而引起相互的敌视——曾经成为伟大文明的有史以来的破坏者。

在短短的 15 年中，俄国曾努力把在东欧和北亚这一广大地区上的原始的居民提高到一个具有专门技能和能写能读的文化水平，而这是不可能运用所谓民主的方法在很多世代里完成的。正在和平的艺术上刚要获得相当的成就的时候，它受到了野蛮的德国掠夺者的进攻，以致它的主要的成就被无情地破坏了。在美国和英国的相当大的物质协助下，俄国挽回了危局，并把侵略者驱逐了出去；在同盟国的军事协助下，它充分尽了它的责任把德国人击败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这个希特勒自称在任何强国的联合下也从来没有屈服过的国家。看来很明显的是，在这个成就上，它获得了各方面不同的人民团体的自发的和全力的合作；而这个结果也不能完全归之于国家的危急，虽然当时的危急的确是极其严重的。因此，很自然，对随便乱讲“民主方法”表示不安的是俄国，对上述三点限制条件的重要性理解得最清楚的也是俄国人。在旧金山会议上的分歧是出于对类型完全不同的社会情况的观察。在英国和美国，专门技能和一般文化的水平是高的，这是由于它们已有将近 200 年的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以及一个世纪以来普通居民都能粗粗阅读的缘故。在俄国就不是这样，它所掌握的专门技能和文化能力必然在它看来还是幼稚的。俄国在发展和平的艺术的同时是否能够也以同样的步伐向民主和群众管理方面发展，到现在来说，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但是，一直在盎格鲁-萨克逊人的文明里无休止地谈论着的民主这个字眼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呢？在英语国家的民主和

^① 《进步和灾难》，纽约，哈普尔兄弟出版社，1937 年版，第 205 页。

所有其他的政体之间的区别是重要而深刻的。所有其他的政体是单面性的，只有民主政体是多面性的。其他的政体，从罗马帝国起到墨索里尼的那个下贱的法西斯主义，可以用一张工程蓝图来表示——权威集中在顶上，以下各级的权威只能由顶上的权威所批准或授予。“霍布斯的巨大的利维坦^①，圣典学者的充分的权力（plenitudo potestatis）、神秘的权威（arcana imperii）、奥斯丁的国家主权，都是同一个东西的不同的名称——这就是从国家统一的概念所演绎出来的立法者具有不受限制的无上权力。至于目前正在考虑中的它是国家或是教会，那是无关紧要的。”^②

在民主国家里没有这样一种最终集中在顶上的权力；从理论上说，权威的中心按照形势的要求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民主政体比君主政体以至共产主义等其他一切政体来得优越。所有其他的政体都是中古式的和僵硬的——权威集中，不论称之为国王或法律——反之，民主政体却大体上非常接近人类和社会发展的规范。在国家遭遇到危急的时候——衰退、战争、瘟疫、水灾、饥荒——中央当局暂时必须掌揽权力，就像一个暴君一样地独断独行，但当危急已经过去，中央的控制就放宽，权威的中心仍旧归到周围的许多组织；因为在工作台上和其他地方的非正式的组织才一直是自发的合作的策源地。中央的和周围的权威就是这样互相补充的——来自上面的是合乎逻辑的和具有目的性的控制，来自下面的是自发的和合作的控制。从历史上说，伟大的民主国家所探求的是明智的控制，

① 利维坦（Leviathan）是《旧约》里巨大海兽的名称，霍布斯用它作为书名的意思是指巨大的权利。——译者

② 非吉斯：《现代国家里的教会》，伦敦，朗曼斯·格林公司，1913年版，第79页。

而不是权威；它试图把任何困难发生时做出决定的中心安放在接近于形势所要求安放的地方。一个明智的行政人员就是这样地规划出他的政策，即使在现代工业里人们也能找到这样的行政人员。使所牵涉到的团体充分表达他们的意见是同由少数具有高深专门技能的人所设计出来的合乎逻辑的和有目的的规划是一样重要的。因为一个社会必须在谋求技术上的进展之外还要获得每一个人的有效的参与和合作。

这样，有效的合作是我们在 20 世纪中叶所面对的问题。没有什么“主义”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这个完全被忽视的什么是自发参与的决定要素的问题上，必须满足于回到耐心的踏实的工作。民主制度的定期选举只不过是使一个社会把控制的中心按照智慧和理解所指示的方向而转移的一个原始的和粗糙的办法。在这些事件上，我们的政治领袖和科学领袖使我们感到失望；我们必须重新再试。

政治的领导在这本书里并没有深入讨论，虽然第二章的《乌合之众的假定及其必然的推论，国家绝对》里指出了在我们的政治思想里正同在我们的经济思想里一样所存在的缺点。然而，我希望我们可以在以后什么时候出版一本关于研究工业文明的政治问题的书。

把科学方法应用到社会情况的研究，在可能把运用在工业里进行现场研究这一个方法所得到的结果叙述出来之前，需要有一些先行的按语。因此，在第一章《进步的黯淡面》中提到了系统研究中的不平衡状态——对技术的和物质的研究的过分偏重而把人的和社会的领域（医学除外）放弃给那些无聊的“主义”和偶然的猜测。

如果必要，原子弹在这个时候出来提醒我们要既注意我们的成就也注意我们的失败。我们已懂得怎样在一刹那间毁灭千万的生灵，而不懂得怎样有系统地着手引导各种团体和国家在

创造文明的事业上进行合作。

并不是原子弹要毁灭文明，而是文明社会能够毁灭它自己——无疑地，最后要用到炸弹——如果它缺乏明智的理解和不能控制对合作的支持和阻碍。

你自己对于为了认真负责的生活的教育的讨论指示出了我们必须遵循的道路。

你最忠诚的 E. 梅岳

1945 年 10 月 1 日

提 要

哈佛大学商业管理研究所工业研究部成立于1926年，其任务为组织和指导关于工人和他们在工厂里的工作的研究。它的调查研究运用现场的方法更多于运用实验的方法，它的工作不是在实验室里而是在厂房里进行的；在厂房里，一个工人的“全部情况”可以在他具体的物质的和社会的环境里加以观察。在这本书里，一开始就参加了这项工作的梅岳教授，不仅报道了这些调查研究的结果，而且更重要的是说明了“我相信这种启示所具有的对于我们这个被战争所蹂躏的世界的重要性”。他的论点提要如下：

社会组织有两个不同的原则——这两个原则的区别还有人没有理解——一是已经定型的社会，一是能够适应变动的社会。

在原始社会里，或是在一个世纪以前或更早一些的美国和欧洲的社会里，团体的规范决定着社会上各种事物的秩序和个人生活的方向；个人利益是从属于团体利益的，这是出于他自己自幼养成的热切愿望的；作为报答，团体给他稳定的生活、有保证的工作和满意地参与社会生活的机会。这是一个定型的社会。

同这种社会相对照，当前典型的工业社会是一个适应变动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包含着各种出身不同的个人，他们中间有很多为了教育和职业，曾经多次地从一个团体转移到另一个团体。这些人中有很多人在同其他人们的相处上发生种种困

难，结果成了孤独的和不愉快的人；很多人发生了一种根本的假定，认为这个世界同他是敌对的；有些人的反应是过分地进攻性的，有些人则是过分地防备性的；许多团体常常形成一种对其他团体戒备或敌对的态度，处理人事的能力（就是同别人合作的能力）消失了。

定型社会以它的学徒制度来同时发展个人的处理技术的能力和人事的能力；但是在适应变动的社会里，在发展处理技术的能力和人事的能力上是存在着不平衡的。这对社会所造成的后果是很不幸的。如果我们处理人事的能力的提高能跟得上我们在处理技术的能力上的发展，也就不致又发生一次欧洲大战了。

有人可以下结论说，除非回返到传统去，自发的合作是不可能恢复的。但在现在这些日子里我们是不能够走这条路的，因为返回到单纯的生活并不是容易的事情。我们不能一只脚踏在 20 世纪另一只脚踏在 18 世纪而得到生活和繁荣。我们一定要找到合作的办法，而合作不是等待机会得来的——不论是在政治的或在工业的单位里都是如此。我们需要能在特定的局面里有效地运用那种处理人事的能力。这不是信口开河，不管说得怎样正确，所能代替的。一直要等到社会学和心理学能够从虚心地和踏实地处理人事的能力上发展，开始对人的了解，一直要等到这时候，我们才能免于继续看到技术的前进不断地引起社会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

已经进行的实际的工业情况的研究指出了同伙伴搞好关系的愿望，就是所谓人类社会结合的本能，很容易胜过单纯的个人利益和逻辑思考。我们第一个调查，约在 20 年以前，一下子就碰到了个人打算是推动工作的足够的动力的这一假定所不能解释的实例。在一个纺织厂里面的一个“问题”很多的部门里，当那儿的工人彼此之间有了互相理解和合作的机会以